

這一章使我重新思考我對文革重新分期的主張。我曾論文革的持續應重新劃分為三年，即從1966年到1969年，而不是官方欽定的十年，即從1966年到1976年。^②這一論點基於我所認識的這一事實：至1969年，在三年社會動蕩與內亂後，國家又重新回復到了壓制性的正常狀態，這就突出地標誌了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並非只我一人認為文革結束於1969年。二十六年來，每個人——從政治精英到各派普通羣眾——都認為文革已經結束了。但是，如果在1973年到1974年間，社會確實再次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普通老百姓確實為尋求社會公義，重新組織起自己的違反集團（雖然這些集團是以不同名目出現的，這一點據王所記錄，曾於武漢發生），而譜寫了另一段文革插曲。那麼，或許文革分期問題應在此證據下被重新審視。

今天，在文革爆發三十週年之前夕，各種類型、從各種角度、用各種語言出版的文革研究已不少。文革中的事件現在無疑已被置於歷史景觀之中，而因為文革研究著作制約了人們對這些事件的感受與理解，或許現在也是著手研究文革史學史的時候了。在這一研究計劃中，本書無疑應被列入第一手資料中，並期待比這篇書評更深入詳盡的分析。

文革「故事」從何說起？

兼答陳佩華的批評

王紹光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文革是一個很長，很複雜的「故事」。它有幾億個人在其中扮演角色；它的場景既設在中南海，又設在北京的清華園，上海的人

② Anita Cha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no. 1 (Sept, 1992), pp. 61-85. 中譯文見《當代中國研究中文論文》(1993年6月)。

民廣場，武漢的紅樓，陳佩華女士筆下的陳村，及其他成千上萬知名和不知名的地方；它的情節中有宮廷陰謀，有血與火，有淚與笑，有愛與恨；是正劇、悲劇、喜劇、鬧劇的混合物。像這樣一個「故事」，任何人都可能把它說全、說清、說透。像我這樣的愚鈍者自然不存此奢望；即使聰明自信者如陳女士也未必有此功夫。

故事總要有人說，問題是從何說起？陳女士與我的分歧正源於此。

一 「故事」說與誰人聽？

文革的「故事」，我已講了三遍，每次的讀者不同，講法當然也不一樣。

我第一次講文革「故事」，是將它寫成博士論文時；^①對象當然是我的指導教授們。那時的講法完全是美國大學博士論文方式：啓合承轉，中規中矩。有腳注（佔論文篇幅的五分之一強），有引文，有參考書目（34頁之長），還有八十五位受訪人的簡歷（包括性別、年齡、家庭背景、政治面貌、職業、教育程度、工資、文革中所屬派別）。更重要的是，為了表明自己對中西文革文獻的熟悉程度，論文一開頭就來了個「文獻回顧」，對所有陳女士指責我忽略了典籍都誠惶誠恐地一一列舉，當然也沒敢漏掉陳女士的宏著《毛主席的孩子們》。

第二次講文革「故事」，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約我將博士論文翻譯縮寫成中文時。^②編輯很明確地告訴我，中文版的讀者設定為一般

①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② 王紹光 《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由於該書由四人譯校，各章風格也變得不太一樣；這是另一輯憾事。

想了解文革過程的人，不是學院派的專業研究人員。另外出於商業考慮，編輯建議將論文的篇幅從九百多頁壓縮為三百頁左右。這雙重的考慮，迫使我不得不從四個方面對原著進行大幅度刪剪。一是砍掉分析文革前中國社會結構和潛在衝突的第六章；二是砍去除下各章中涉及外地文革的內容（很多章從幾十頁砍為幾頁）；三是刪掉了不少細節性的描述和分析性的討論（如對造反派頭面人物的刻劃，對七三——七六年派性鬥爭特點的分析）；四是刪掉了所有注釋。這些不得已的刪剪使原著的學術性受到損害，也是惹得陳女士大搖其頭的原因。對此我已在中文版「後記」中致歉。但對一般中文讀者來說，這些刪剪也許無關宏旨，因為他們未必關心陳女士斤斤計較的「誰最先提出甚麼觀點」之類的問題，也不太可能去查證參考文獻所列舉的幾百種書目。

第三次講文革「故事」是在我的英文書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中。^③ 這次講故事的對象是西方學術界，因而講法嚴格遵循西方學術標準。如果陳女士判斷一書價值的尺子只有一把——西方學術標準的尺子，她實在不必費神對拙著中文版那麼認真——它本不是寫給她這種人看的。我倒有興趣聽她對拙著英文版的評論。

陳女士也許聽說過，中國有句俗話「到哪座山上唱哪支歌」。唱歌如此，講故事也如此。俗人如我遵循的是俗規矩，如果這樣做不意傷了陳女士的雅興，只好再次致歉。

二 講誰的「故事」？

無論中文和西文講文革「故事」的書，講毛澤東個人作用的最多，至少從數量上講是如此。但文革並不是他一人的故事，也不只是中南海內豪門恩怨的故事，而是億萬人的故事。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英文中出現了一批分析文革中羣眾角色的書。但「羣眾」是個很廣很模糊的概念。在北京中央各部，十六、十七級的幹部可以視為「羣眾」，但到一個縣裏，十六、十七級幹部可以成為本縣頭號當權派。拙著講「羣眾」，無非是參加文革時期各羣眾組織的人們。我想討論的是這些人為甚麼參加不同派別？他們的行為方式有甚麼特點？他們何時退出政治，成為逍遙派？不錯，我採訪的對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武漢各派的「頭頭」。但他們文革前全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文革中只鬧騰了幾年，現在又成了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把他們當作「羣眾」的一部分對待，了解他們的經歷，似乎並不與研究文革中羣眾作用的目的相違背。

但「羣眾」與「羣眾」不同，文革中不少大字報落款「革命羣眾」，是為了掩飾作者的身份。但此「革命羣眾」往往與被「革命羣眾」觀點不一，且鬥得死去活來。因此聽一部分「羣眾」的文革「故事」是很危險的，它會使人以偏概全。而上而提到的那批英文書依據的材料來源十分狹窄，無非是流傳到海外的文革小報和逃港人員的敘述。文革小報有個特點：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得少。原因很簡單，造反派中聚集了當時的知識精英，鼓唇弄舌是他們的看家本事；而保守派大多為大老粗，不善言詞。流傳到海外的小報局限性更大，主要是發行於北京、廣州的小報。北京方面由各國使領館人員收集，廣州方面由港客收集。其它地區的文革小報流到海外的總量也許不少，但至多只是各地小報冰山的一角。我在武漢兩家圖書館看了它們收藏的很小一部分文革小報，絕大多數是海外不可能有的。逃港人員也有個特點，他們多為來自廣州的中學生，且幾乎全是造反派。由於材料的局限，西方為數不多的研究文革中羣眾角色的著作，基本上講的是廣州中學生造反派的「故事」。他們的「故事」對了解文革有極大的價值，但也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地域的局限。廣州的文革的確很豐富，但全國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上百個市，二千多個縣，各地文革既有相同之處，但也因

③ Shaoq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種種因素帶有本地特色。二是社會集團的局限。中學生在文革中起了打頭陣的作用，但他們在地方政治中畢竟是跑龍套的，不是重要角色。三是派別的局限。造反派的「故事」至多是一面之詞，依據一面之詞作出的任何判斷都是片面的。我在武漢採訪原保守派和造反派人物時，發現他們對同一事件描述總是南轅北轍，偏聽偏信任何一方都不行。

陳女士懷疑我採訪的多是保守派，所以對造反派有「偏見」。其實我採訪的人中造反派佔大多數，她列舉我對造反派有偏見的三條證據其實都不很硬。一是我稱造反派頭頭為四人幫的「走狗」。事實上，在英文中我用的是 adherents，譯者譯成「走狗」，我審稿不小心沒改過來。我的意思是「追隨者」，一個中性詞。二是我說造反派推薦七人當團省委副書記，其中四人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團員，而且年齡偏大，沒有重新入團的資格，因而「非常可笑」。陳女士指責我對造反派「加以嘲諷」。問題是這件事本身是否可笑。如果有七十老翁要加入童子軍，不管他人品如何，該舉動總是可笑的，這有甚麼疑問嗎？三是我說在1976年，武漢的造反派頭目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中央的「文革」派得勢上，而人民羣眾越來越不支持他們。這並不是「嘲諷」，而是事實。就在這段話以前，我引述一位造反派頭面人物的話「現在至少有80%的人是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基礎」(p. 283)，其實80%是低估，當時連大部分前造反派也不支持這些一心攪權的造反派頭目了。這些頭目們自己都認識到了這一點，我還有必要「嘲諷」他們嗎？

依我看，不是我對造反派有偏見，而是陳女士對造反派有偏愛。偏愛來自於她單一的信息源。她採訪的是造反派學生，讀的是造反派小報，後來接觸的也多是造反派人物和他們的作品（如楊小凱、劉國凱、鄭、李一哲大字報），這樣講出來的自然是造反派的「故事」。我懷疑陳女士從未接觸過保守派，從未比較保守派關於文革的「故事」與造反派的「故事」有甚麼不同。由此貿然聽了一面之詞便在感情上傾向講「故事」的人，這恐怕算不上嚴肅認真的

學術態度。我得承認，文革初期我傾向保守派，但參加的是武漢的「思想兵」，即造反派組織。到七三、七四年我很同情被整的造反派，還曾鼓勵我的學生們（我當時是高中教員）起來「反潮流」。因此，我自認為能在兩派中取較為中立的立場，當年如此，現在仍如此。如果沒有對造反派的「偏愛」，大概是不會覺得我對造反派有「偏見」的。

陳女士對造反派偏愛的另一原因恐怕是她把造反派理想化了。我在拙著中文版第十七章中說，一般的造反派「雖然長期以來可能一直對以自己的頭頭上司為代表的行政機構不滿，但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過目前的社會政治制度有甚麼缺陷，更不用說如何改造它」。因此，當文化大革命給他們提供造反機會時，他們狂熱地利用這個機會迫害那些他們認為曾經虐待過自己的人。毛的名言『不破不立』成了他們的座右銘。但當毛號召他們在舊體制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權力機構時，他們卻難以擔當此任。他們很少關心新的權力機構的特點，也從未考慮過如何在與人民的正式關係上使自己與舊當權派區別開來。他們感興趣的只是權力本身。盡最大可能掌握更多的權力成了每個組織的主要目標」(p. 209)。這段話表達的看法，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從與幾位武漢的前造反派思想家反覆討論後得出的結論。這些造反派思想家從一九六七年底起就開始對一般造反派表示失望，認為他們「破」勁有餘，「立」願闕如。的確，造反派的破壞性極大：僅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幾個月就打死保守派600多人，打傷打殘66,000人(p. 162)。這比破四舊時期、武鬥時期，和「清理階級隊伍」後那幾年加起來造成的傷亡還要大。但造反派大小頭目打垮保守派後，很快又陷入內戰，這次爭的是革委會中的席位。到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間，武漢造反派再次崛起時，頭頭們爭的依然是在革委會、團委、婦聯、工會中的席位。陳女士認為他們是為理想和正義而戰。我倒想請教陳女士，他們的「理想」是甚麼？他們追求的是甚麼「正義」？陳女士應該了解，文革中派系鬥爭的特點是「翻燒餅」：不是這一派受壓，就是那一派受壓。造反派受壓

時，會產生「翻身」的願望，會為「翻身」而奮鬥，但「翻身」的目的是將保守派壓下去，而不是追求甚麼「正義」。當時政治鬥爭的邏輯一言以蔽之：「你死我活」。直到我一九八六年採訪各派人物時他們的這種情緒仍然很強。八十五個採訪者中只有二人表示願意了解對方，其餘的人仍相互恨之入骨。據我所知，文革期間只有杭州的一小批人希望超越造反派保守派的界限，建立以普選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來替代派系鬥爭（p. 220）。其餘的造反派們，包括楊曦光都沒能擺脫派系鬥爭的羈絆。在那種政治氛圍中談「正義」，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當然造反派確有人為理想而戰，如武漢的「北鬥星學會」，上海的「東方學會」，湖南的「省無聯」。海外只知道「省無聯」和楊曦光，卻不知道與它同時存在的「北鬥星學會」。殊不知「北鬥星學會」兩大台柱魯禮安、馮天文（均為華中工學院學生）在《楊子江評論》上所發表的幾十篇文章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文采上都比不上楊曦光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那篇《中國向何處在？》遜色。他們的理論在當時被稱作「新思潮」，「新」就新在其目標不是在革委會中佔據幾個席位，也不是改組官僚政治，而是要創造一個「巴黎公社」式的全新社會。「北鬥星學會」與「省無聯」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僅進行理論上的探討，而且試圖把其理想付諸實踐。湖北省滬水縣巴河區的「新農村」試驗便是初步的嘗試（p. 212）但是「新思潮」在實際政治中的影響十分有限，「北鬥星學會」的主要成員加起來也不過二十多人。武漢各大造反派組織當時熱衷的是在談判桌上和戰場上爭奪權力，對「新思潮」完全不屑一顧。七四年，武漢造反派再次得勢時，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傳到了武漢（大字報作者之一李正天在武漢長大，文革頭幾年與武漢造反派經常來往，十分熟悉）。但當幾位受「新思潮」影響的青年人向造反派頭目推薦「李一哲大字報」時，他們沒有絲毫的興趣。他們的興趣仍在自己能得到甚麼職位上。陳女士指責我沒將「李一哲」式的造反派與嗜權的造反派區分開來，但我之所以寫有關「新思潮」一

章就是要作出這樣的區別。^④反倒是陳女士本人用「李一哲大字報」這個例子來證明造反派追求的是「理想」和「社會正義」，十分令人詭異。造反派中的個別思想家追求某種理想並不意味造反派中的人大多數人和其頭面人物也追求這個理想，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⑤以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的武漢為例，那兒的確有幾個與李一哲大字報共鳴的造反派活躍份子，但他們無法影響絕大多數仍活躍的造反派。雖然同為造反派，後者在前者眼中毫無「理想」可言。如果我們像陳女士那樣，由前者有理想推斷出後者也有理想，這種做法，客氣地講是可笑的，不客氣地講則是對歷史的無知。

三 「故事」講完了嗎？

我在拙著中說，雖然文革研究已有大量文獻，「但我們對文革的了解依然是很膚淺的」（p. 1）。但陳女士對此大不以為然，她反詰「現存文革出版物貧乏嗎？」為了證明她的觀點，她列舉了中西文有關文革的一些近作。我絲毫不想否認這些著作的意義。但我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文革的「故事」還沒有講完。

儘管有金春明，王年一等人的研究，我們對文革中高層政治是怎麼進行的仍十分不了解。近年來回憶錄多了起來，如王力的《現

④ 我在博士論文中討論了1974年的「新思潮」，見 pp. 775-784，只可借中文版中刪掉了。另外論文中也有一節專門討論1974年的派別鬥爭與文革早期的派別鬥爭有其變區別。其中最顯著的區別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都失去了單基礎，造反派尤為如此，見 pp. 768-775。

⑤ 需要指出的是，造反派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今天看來並不理想。省無聯和北鬥星學會追求的是一種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還在滬水縣巴河區的「新農村」試驗中看得很清楚。楊曦光後來反思說「我們當年宣揚的東西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如果因我們有幸成功，會給中國帶來一場大悲劇。」見楊小凱刊於《爭鳴》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上的文章。武漢的造反派思想家們今天也是這麼來看待他們過去的「理想」的。造反派思想家比一般造反派高明之處不在於他們「理想」的內容，而在於他們抵制了權力的誘惑，希望找出新的政權形式的探索。

場歷史》；⑥葉永烈的幾部人物評傳，《葉劍英在一九七六》，《鄧小平在一九七六》，師東兵編輯的多卷本文革史料，等等不一而足。但高層政治中的疑點依然很多。

談到下層政治，我們還沒見到幾本研究北京、上海、廣州以外文革的書，還沒見到幾本研究中學以外社會集團在文革中表現的書。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幾乎沒有見一本以保守派提供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的專著。近年來，以英文發表的談個人文革經歷的書已不下幾十本，中文更是不計其數，但基本上是兩類人寫的，舊精英（資本家、地主、國民黨官員、知識分子）及其子女，和新精英（高幹）及其子女。這兩類人加起來，在中國也只佔極少數，但他們幾乎壟斷了講文革「故事」的權利，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文革「故事」沒有人講，他們自己也沒能力或沒興趣講。西方一般人對文革的印象是從中國新老精英的「故事」中得來的；再過幾十年，中國人自己關於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來自這一小批人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說，誰壟斷了講「故事」的權利，誰就將壟斷了歷史。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我們應該讓更多人^七的文革「故事」留下記錄，而不是像陳女士那樣對已有的研究成果心滿意足，躊躇滿志。

更何況，政治史只是文革的一個側面。文革的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美術史等方面的研究還沒有起步。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過，^⑧這裏不再贅述。但從多個角度對文革進行研究，應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想必陳女士對此不會有異議罷？

四 何緣要將「第一」爭？

陳女士指責我「躊躇滿志地聲稱」，我的書是「中西學術界第一部分分析文革前存在的社會矛盾，以及從澄清文革爆發後縱向聯繫

（精英與羣眾）與橫向聯繫（羣眾之間）兩條線索的角度來研究文革的著作」。這段冗長費解的話，使我嚇了一跳。我自忖沒這個膽量誇下如此海口，但仍害怕由於筆誤寫出了甚麼讓人誤解的話。但反覆將拙著翻了好幾遍，我實在找不出在哪一頁上我曾「躊躇滿志地聲稱」過陳女士指責我聲稱過的話。為甚麼陳女士會作出無端的指責呢？我猜想她是對「誰最先於誰提出甚麼觀點」太在乎，太敏感，到了過敏的程度。

我為中文本一個主要目的是要批評毛澤東中心論，因為中文文革文獻中，毛中心論仍佔統治地位。批評毛中心論，強調研究羣眾作用的重要性，並不等於認為我的研究是開創性的，是「獨一無二」的。陳女士列舉一大堆相干和不相干的文獻來證明別人也曾先於我研究過羣眾，我想問她「so what?」她總不至於認為由於前面已有人研究過某地區某部分羣眾的作用，我等後行之輩就該閉嘴吧？

陳女士另一項批評是我沒有提供新的見解。她認為，我討論「社會矛盾」毫無新意，因為楊曦光（楊小凱）是「第一個聲稱文革應被視為『社會矛盾』的體現，而非一場精英的權力之爭的學者。」陳女士忘了毛澤東才是把文革視為「社會矛盾」體現的第一人。早在1965年，毛已斷言「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p. 19）。後來毛又發明了「走資派」一詞。楊曦光用「紅色資本家」一詞只不過是「走資派」的別稱。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是否認識到文革是「社會矛盾」的體現，而在於理解甚麼「社會矛盾」是文革爆發的羣眾基礎。在這方面，我為毛和楊的看法很不一樣，不知陳女士是否注意到差別所在？陳女士似乎同意楊的分析，認為文革中的羣眾運動是「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對立」的產物，這正是我所不贊成的觀點。我認為，在文革前的中國，精英分子與廣大羣眾的矛盾並不完全突出，突出的是「受惠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矛盾。同為精英，政治精英是受惠階層，職能精英是受損階層；同為羣眾，積極分子是受惠階層，落後分子是受損階層。

⑥ 王力《現場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⑦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

我們很難說拿定息、住洋房的前資本家不享有特權，但他們是受損的。同理，我們無法把廣大生活水平底下的工人稱為特權階級，但他們確是受益的。用「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對立」的分析框架解釋不了為甚麼文革中精英和羣眾都從內部分裂了。我在博士論文中用六章的篇幅來說明自己的這個觀點，中文版將其刪掉的確可惜。

陳女士批評著沒有新觀點的另一論據是，我關於甚麼人參加造反派，甚麼人參加保守派的分析不是「新發現」，而是她列舉的那些西方研究，以及劉國凱之研究的論點。其實我並沒說這是新發現，而且最早發現派別分野規律的也不是那些西方研究，這在文革親歷者中是婦孺皆知的常識，根本用不着「發現」。這是我讀那些西方研究從一開始就不覺得新奇的原因。它們只是對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是「新發現」，劉國凱只不過把人們共有的觀察寫成了文字而已，拙著亦如是。爭論誰先說了甚麼，誰先「發現」了甚麼，在我看來是件很無聊的事。但陳女士對此很在乎，並以此作為對拙文批評的主要論據，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如她多花點筆墨解釋她為甚麼認為我對文革的解釋不能「令人信服」，對我，對讀者都會有更大的幫助。而她也說這兒「令人失望」那兒「不成功」，幾近魯迅說的「模模糊糊地搖頭」，讓我不知所云，無所適從。

儘管陳佩華女士對拙著的批評有點讓我摸不着頭腦，但我仍十分感謝她花功夫閱讀我那本十分不理想的書。文革這麼一個豐富的「故事」，要由更多的人、從更多的角度來講述。我的研究興趣早已它移，幾年前就放棄了文革研究。而陳女士幾十年如一日仍在這塊沃土上耕耘，這種執著十分值得敬佩。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紹光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

拿到王力的《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我便一一氣讀完。王力雖然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拋頭露面的時間並不算長，只有一年左右（1966年夏至1967年夏），但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一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激烈動盪的一年，是最難忘的一年。由王力從幕後走到幕前來講述自己在那段時間裏的見聞，披露鮮為人知的上層政治鬥爭秘聞，是人們等了三十多年的事。這便是我一口氣讀完此書的原因。

《現場歷史》確實講了一些人們以前不大知道的事，也證實了不少以前的猜測，例如：

- 以前我們知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採取向蘇聯「一邊倒」態度是出於無奈，且曾試圖與美國改善關係，但不知道1956年曾有派蔣衛國訪美的計劃。
- 以前我們知道朝鮮戰爭爆發前，毛澤東與斯大林有矛盾，且不願讓中國捲入朝鮮半島的衝突，但不知道1953年毛卻希望乘勝追擊，又與斯大林、金日成發生磨擦。
- 以前我們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在1964年底的一次有關「四清」運動的會議上曾發生很大衝突，毛本人67年初告訐阿爾巴尼亞客人，他是65年初下決心打倒劉的，王任重湖北也曾在66年前向省裏的幹部透露過毛與劉之間有嚴重矛盾，但不知道64年12月衝突剛過，毛已告訐陳伯達，他要搞掉劉少奇。

— 以前我們知道陳伯達與江青有矛盾，陳稱自己為「劉盆子」，但不知道陳被江青搞得想自殺。

— 以前我們已聽說康生和曹耿猷一手操縱炮製了聶元梓的「第

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但不知道曹與聶的關係其實很好。——以前我們知道，66年9月底，中央轉變了運動的方向，決心批判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清楚這個口號出籠的細節。

——以前我們隱隱約約知道，66年12月底，毛澤東曾與中央文革成員有一次重要聚會，但不知道毛有那麼長篇的談論。

——以前我們知道，67年8月毛澤東、林彪曾決定「武裝左派」，但不知道「武裝左派」的想法實際出現在江青的「文攻武衛」說之前。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內容的披露也許並不能改變人們對文革進程已有的瞭解，但它們解答了一些以前使文革研究者困惑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現場歷史》的出版是值得歡迎的。

但是此書無論在架構上，還是在內容上都與人們的期待相去甚遠。在架構上，這是個較雜的集子，而不是個一氣貫通的回憶錄。它一副標題也不甚貼切，因為除「文化大革命紀事」以外，還有對毛澤東的回憶與評價、政策建言，及作者對自己一生及自己所獻身的事業的反思。後三部分也很有價值，但與文革關係不大。

《現場歷史》更大的問題是在內容上。書中不少章節很像中國大陸上常見的「申訴材料」。事實上，它們很可能本來就是寫給有關部門看的申訴材料。作者太注重洗刷自己，是該書最大的敗筆。舉他的「八七講話」為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他這個所謂的「講話」影響很大。1967年夏，他王力是中國政壇上日照中天的顯赫人物。那年7月份，他處理武漢問題時，曾一度被當地羣眾組織「百萬雄師」，及支持「百萬雄師」的八二〇一部隊部分官兵扣押。當他被釋放後返回北京時，主政的高層人員幾乎傾巢出動去機場迎接他，電台還破例反反覆覆播送「王力同志已勝利返京」的消息。更有甚者，中央為他在天安門廣場開了盛大的慶功會。這一切

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作者完全沒講自己當時在重重耀眼光環下的感覺，想必是飄飄然、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吧。1967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王力政治生涯的巔峯。在那種情況下，作為一顆快速上升的政治明星，講他講的那些話，影響不大才是咄咄怪事。

在書中多處，作者反覆想說明兩點：一、他在「八七講話」中所講的東西無非都是毛澤東已講過了；二、全國上下流傳的他的講話稿漏掉了不少他謔的內容。這兩點也許全是事實。其實，在文革高潮期，中央領導人中有誰敢公開講毛澤東沒有講過的話？問題是毛澤東講過許多話，轉達時各人有各人的側重面。這就是為甚麼同是轉達毛的意思，周恩來顯得保守，江青顯得激進。王力當時被人們普遍認為屬於最激進的文革領導人之一，這並不是全往毛澤東那幾一推就能一了百了的。

說到他的講稿在流傳中有所遺漏，這也沒甚麼奇怪。文革高潮那一兩、三年，小報上印的、大字報樣上貼的所謂「首長講話」哪有完全準確的？連所謂「毛主席未發表詩詞」都大部分是誤傳的。王力的「八七講話」也許記得不太準，但其傾向性是明白無誤的。作為文革運動的前沿指揮之一應該知道，講話公佈後，各種派別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釋，各取所需。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是如此。如果自己的一篇講話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僅僅責怪人家沒全面準確地理解，說得過去嗎？你王力有那麼大的影響，怎麼能不考慮自己講話可能帶來的後果呢？

除了《「八七講話」》一篇外，其餘有關文革六篇文章，也是以自我辯護為主旨。《打倒王力之謎》將他描繪成自覺抵制江青錯誤言行的好漢。《駁「王力是康生的人」》極力洗刷自己與康生的關係。《二月逆流》推脫他在整個事件中責任。《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對陳再道寫的同名回憶文章涉及王力部分逐句反駁，根本忘了交待該事件的來龍去脈。《澄清其他幾個問題的真相》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不要怕亂」問題、全而奪權問題、「揪軍內一小撮」問題，和給四川的劉結挺、張西拒翻案問題。在

所有這些問題上，作者都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人身上。《王力忠痛症後的遺囑》則力圖證明「王力是清白」的。

如果作者不是顯得那麼急於洗刷自己，效果也許會好得多。誰也不會把王力當作文革的萬惡之源。他之所以在67年8月下旬突然從權力的巔峰跌下來，顯然是由於毛澤東、江青等人鼓吹的「抓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武裝左派」等激進口號造成了全國硝煙四起的危險局面。為了防止全面內戰爆發，必須收回「抓軍內一小撮」和「武裝左派」這兩個危險的口號；而要收回這兩個口號且不損及毛澤東與江青的權威，必須有人充當替罪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說王力不過是個替罪羊，這其實是許多人的共識，用不着王力本人費盡心機證明這一點。作者之所以用很大的篇幅為自己開脫，是因為他當初寫書中一些章節時，想像中的對象是中央領導。為了爭取恢復黨籍，竭力證明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為無非是追隨黨的最高領袖，並沒有違反黨章黨紀是可以理解的。但作者不應忘記，作者還有別的標準——道德標準。大部分讀者恐怕用的就是這一標準。太偏重為自己辯護反倒容易引起讀者的反感。不如平鋪直述，將事件前後經過娓娓道來，避免夾述夾議，讀者心中自有公道。

據說作者正在撰寫《王力文革回憶錄》和《一九五七—一九六七回憶錄》，希望他在新的書稿中能克服上面提到的思路上的問題，對這兩部新書，我們翹首以待。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王大剛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及亞洲研究院訪問學人

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在海外出版了許多大陸中國人的各種回憶錄和傳記。這些出版物回顧了普通中國人在歷次政治動蕩中的種種

遭遇，加深了我們對現代中國歷史、社會政治制度的理解。但我們對監禁中的政治犯的經歷，知之甚少。

《牛鬼蛇神錄》就是給犯人「樹碑立傳」的書。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每次政治運動中，總有一大批人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關、被管或被殺。書中有鎮反時關押的「歷史反革命」、「丘老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資本家「盧晴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劉鳳祥、何敏和；四清運動中清理出來的「階級敵人」吳顯德。更多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各種罪名的政治犯，如「湘江風雷」的「壞頭頭」張家政、「反革命集團首犯」張九龍。

作者在被關押的十年(1968—1978)中，一直在有意識地了解和接觸各種政治犯，與他們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犯人才願意把他們的故事告訴他。作者決心不能讓發生在中國古拉格羣島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要把他親眼所見的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此本書不僅僅是作者本人的「獄中回憶錄」，而且是中華民國共和國歷史最黑暗的一部分，是被歷史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遺忘的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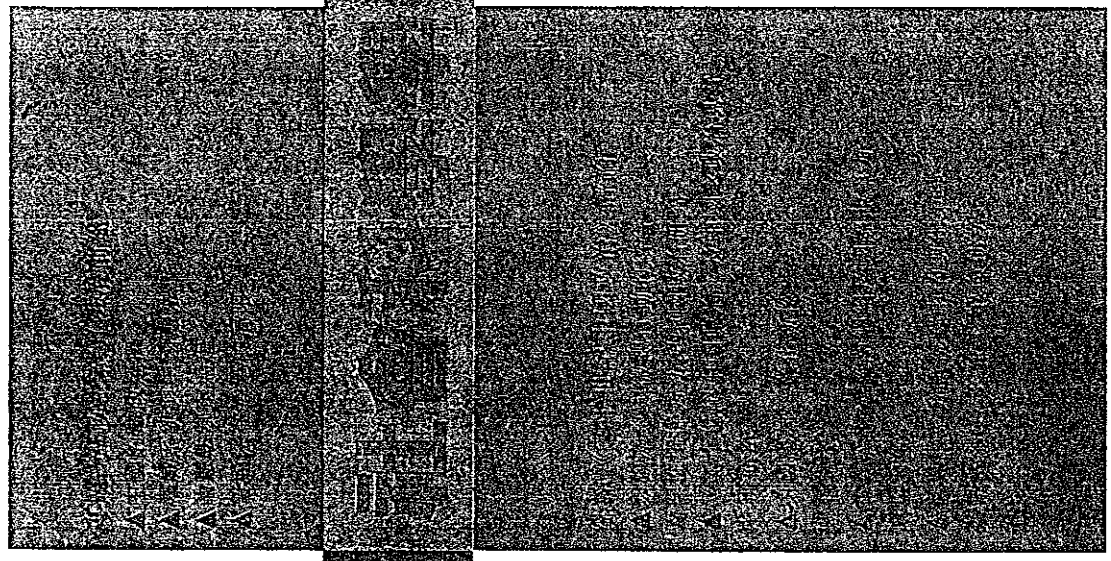
全書共二十八章，多數章節是以這些犯人的名字或綽號為題，講述了幾十個犯人的故事。但該章又不是專談此人的故事，往往穿插着其他的內容。初讀起來使人感到雜亂無章，主題不明。讀完全書後使人感覺到，甚麼是「革命」，甚麼是「反革命」，是貫穿全書而又沒有答案的一個主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詞典中，「反革命」的內涵含糊不清而又極大的隨意性。當時的政治形勢，當局的政策，高層領導內部鬥爭，政策執行人的意志及品德都可以賦予「反革命罪」以不同的內容。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拿起千斤，放下四兩」。作者本人的經歷就是一個案例。

楊曦光出生在高級幹部家庭。1959年父親因反對大躍進，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2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不得不向黨內務實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讓步，他父親也得以平反。文革一開始，長沙一中七七歲的中學生楊曦光參加了反工作組的鬥爭，

No. 6, 1996, AUTUMN

第六期

一九九六年 秋季



香港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一九九六年 秋季 第六期

No. 6 AUTUMN

OXFORD

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編
ed b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SN 1021-6619

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編